

# 从生存到发展—论中国政治的根基

陈童

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中，大禹治水的史诗绝非简单的治水成功故事。它以一种近乎神话的叙事，刻入了民族的政治基因：面对滔天洪水这一生存威胁，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应运而生，其存在的唯一目的，是组织起来、疏而非堵，最终引领民众走出困境。这个朴素的起点，昭示着一种独特的政府逻辑：政权的合法性，深植于其对人民最根本生存需求的回应与保障之中。数千载轮回，当新中国在战火与贫弱中诞生，其“救亡图存”的革命起源，正是“大禹精神”在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悲壮回响。而今日中国提出的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则标志着这一逻辑的历史性升华——从保障生存的初始使命，迈向实现人民发展的更高追求，勾勒出一条与西方利益集团政治截然不同的治理轨迹。

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源泉，始终紧扣着“人民”这一核心坐标。大禹面对的不是抽象的敌人，而是直接威胁部落存亡的洪水；他所建立的权威，并非来自神授或暴力，而是源于成功解决“民之生存”这一最紧迫问题的能力。这种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朴素治理观，为中国的政治哲学奠定了深厚的民本底色。及至近代，山河破碎，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神州，“救亡图存”成为时代的最强音。新中国的成立，本质上是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救运动的最高成果。革命的合法性，正来自于它承诺并实践了带领人民摆脱屈辱、实现民族独立与基本生存保障的历史使命。这与大禹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所象征的公共责任与奉献精神一脉相承，都指向一个核心：政权的根基在于回应和满足人民最迫切的生存需求。

当生存的威胁基本解除，中国政府的使命便自然地、也必须地迈向更广阔的维度——发展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从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到“科学发展观”，再到新时代强调的“美好生活需要”，中国政府的叙事核心实现了从“生存”到“发展”的深刻跃迁。这里的“发展”，早已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，它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体系，涵盖了物质丰裕、精神富足、社会公平、生态良好等全方位目标。这意味着政府的职能，从提供基本安全与生存保障，扩展为创造机会、搭建平台、维护正义，最终服务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。这根源于共产党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根本宗旨，也是其对人民“生存”以上更高层次诉求——对尊严、对幸福、对实现自我价值——的自觉担当。

将视线转向西方，其政府逻辑的底色则呈现出显著差异。奠基于社会契约论等思想的西方政府，固然在历史上保障公民权利、限制权力滥用方面有进步意义，但其实际运作常难以摆脱“利益集团博弈平台”的窠臼。不同的财团、行业、阶层通过游说、政治献金等方式竞逐自身利益最大化，政策输出往往成为各种势力博弈、妥协乃至“分赃”的结果。虽然其民主形式标榜“多数决”，但在资本力量深度嵌入政治结构的背景下，“少数”强势集团的利益常常凌驾于“多数”普通民众的福祉之上。这种逻辑下，政府的公共性易于被稀释，其目标常是维持竞争性利益格局的平衡，而非指向一个统一的、以全体人民福祉为皈依的长远愿景。与中国“人民至上”的整合性目标相比，西方的治理模式更接近于一种“集团优先”的分配性政治。

从大禹疏导洪水为民开辟生存空间，到新时代中国为十四亿人民描绘共同富裕的发展蓝图，这条“从生存到发展”的脉络，清晰勾勒出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与价值追求。这不是冷冰冰的统治术，而是一种根植于文化血脉、淬炼于历史实践的责任伦理。它意味着政府并非高踞社会之上的特权化身，而是深深嵌入社会肌理、以人民福祉为终极目标的组织形态。在全球面临不确定性、诸多政治模式显现疲态的今天，中国的实践昭示了一种启示：政府的合法性，终究要在其服务对象的生存质量与发展境遇中获得最坚实的证明。当发展的成果如江河般滋养每一寸土地，政府的根基便如磐石般稳固，这是超越一切喧嚣浮辞的历史辩证法，也是中国从古老传说中汲取的永恒智慧。